

利益、相对实力与中国经济外交的策略选择

孙 雪 仇华飞

[内容摘要]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是经济外交的重要参与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多种类型的经济外交方式。既有的研究文献对中国经济外交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的解读,但也存在着研究中引入影响因素过多的缺陷。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利益和相对实力两方面构建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类型选择的研究框架。运用该框架,本文选取与中国相对实力相差较小的法国和与中国相对实力相差较大的蒙古国作为分析对象进行了详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外交事件带来国家利益增益时,中国会采取积极的经济外交类型,当外交事件损害国家利益时,中国则倾向于使用消极的经济外交类型;当国家间相对实力相差较小时,中国在运用经济外交手段时会更加谨慎和克制,当双方实力相差较大时,中国的经济外交类型的选择会更具弹性。依据两类影响因素的4种组合,本文将中国经济外交的类型划分为合作型、援助型、施压型和制裁型等4种类型。

[关键词] 国家利益 相对实力 经济外交

[作者简介] 孙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硕士研究生;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中国经济外交的相关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间的互动日益密切,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经济要素在国际行为体的政治互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凸显,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济实力,提升经济竞争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活跃

度和参与度日渐增强。以此为基础,通过对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换,中国的经济外交能力得到大大提升,逐步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表达外交诉求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济外交经验,针对不同的国际形势能够采取类型丰富的经济外交手段。例如在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外交中,中国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开展以“投资”和“发展”为重点的外交援助;^①面对全球气候问题,中国将环境外交拉入经济外交范围之列;^②2006年针对朝鲜的核试验行为,中国参与了联合国主导下的惩戒行动,对朝鲜进行选择性制裁。由此可见,中国采取的经济外交类型多样。那么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类型选择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由于当前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的分析,在加深对其类型选择理解的同时,存在着变量过多的局限,本文试图从利益和相对实力的角度分析其类型选择,从而丰富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争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已形成很多文献,运用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流派,来探析中国经济外交的内涵、发展进程、机遇和挑战。^③这些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外交的历程以及一般性规律,但往往因为忽视对中国经济外交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分析,难以对经济外交类型的多样性做出有力解释。本文关注另一种中国经济外交的研究视角,主要在于探讨中国经济外交的不同类型及其影响因子。^④在这些研究文献中,按照归因主体的维度不同,现有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层面。“经济建设论”和“战略导向论”是国内层面的主流解

① 郭宏宇:《从经济协调的重点领域看中国对非经济外交》,《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102~112页。

②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24页。

③ 张梅:《对外产能合作:进展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7~119页;贾永轩:《国家间外交关系的新趋势——经济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1期,第60~62页;周永生:《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外交概念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第39~44页;Christina Lai, “Acting One Way and Talking Another: China’s Coercive Economic Diplomacy in East Asia and Beyond,”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1, No. 4, July 2017, pp. 1~19;崔绍忠、刘曙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外交职能及其关系——中国的视角和经验》,《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43~55页。

④ 王存刚:《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120~135页;王树春:《论“经济外交”视野下的中俄关系》,《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第58~63页。孙灿、洪邮生:《国际体系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经济外交运行的“平衡术”视角》,《外交评论》2016年第6期,第1~21页。

释,在国际层面,存在着“体系推动论”和“运行成本论”两大观点。

(一) 国内层面

“经济建设论”认为国内经济的建设状况和发展重心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目标和布局的关键因素。叶皓从国内经济发展转型出发,指出国内经济的壮大形成了对外部资源和市场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外交实现以意识形态为基准向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转型;^①宋国友注意到国内经济发展这一中心工作对于经济外交的推动作用,同时还提出了在推动积极的经济外交的同时关注安全外溢性的观点;^②另有学者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中资源安全的重要性。^③ John Ravenhill 和 Yang Jiang 在研究中国参与特惠贸易协定(PTAs)框架制定的过程中发现,寻求加强资源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外交的立场和进程。^④ 同样从国内层面出发,吴白乙关注国内经济不断提升的对外依赖度和敏感度,由此产生的需求缺口推动了中国经济外交致力于寻求和维持供应网络的交互使用;^⑤ OH Yoon Ah 也关注到了中国经济外交过程中的商业影响因素。^⑥

“战略导向论”主张在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将经济外交看作推动国家对外战略的物质性策略。郑永年和张弛将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分为硬力量、软力量和协商力量三种类型,并注意到邓小平时期“韬光养晦”的策略推动了中国运用低姿态的经济外交政策展示其软力量,进而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⑦与这一观点相似,邱丹阳通过考察大国兴衰的历史教训和国际社会的规则

① 叶皓:《对深化经济外交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37~43页。,

② 宋国友:《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41~52页。

③ Axel Dreher, Andreas Fuchs, “Rogue Ai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8, No. 3, August 2015, pp. 988 ~ 1023; Matthias Busse, Ceren Erdogan, Henning Mühlen, “China’s Impact on Africa: The Role of Trade, FDI and Aid,”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Vol. 69, No. 2, May 2016, pp. 228 ~ 262.

④ John Ravenhill and Yang Jiang, “China’s Move to Preferential Trading: A New Direc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58, No. 18, 2009, p. 27 ~ 46.

⑤ 吴白乙:《中国经济外交:与外部接轨的持续转变》,《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11~19页。

⑥ OH Yoon Ah,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to Asia: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December 30, 2016, p. 23.

⑦ 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6~12页。

设定,提出强势经济外交是实现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主要手段。^①与战略导向型的分析逻辑不同,李巍和孙忆根据外交关系的性质与手段,将其划分为援助型、合作型和制裁型3种经济外交类型。其中,在援助型经济外交中关注到战略推行过程中军事和道义上的外溢对经济外交的推动作用,在研究中提出对外援助对中国实行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扩大影响力的作用。^②作为研究中国援助型经济外交的学者,Mario Biggeri 和 Marco Sanfilippo 强调了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战略的互动驱动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行为。^③

(二) 国际层面

“体系推动论”把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类型选择的原因归结为国际体系中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江瑞平以中国经济外交的机遇和挑战为突破口,认为在国际层面,经济全球化、多极化演进、区域化发展提升了经济的影响力,拓展了国际交流和互动的平台,成为影响经济外交类型的重要驱动力。^④在经济全球化的分析逻辑下,周永生和刘锦明提出竞争是经济外交内在驱动力和本质属性的观点。^⑤以多极化演进为研究框架,俞正樸和阙天舒将多边合作共治看作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趋势,主张将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多边主义和睦邻政策相结合。^⑥在区域化发展的研究中,王逸舟将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作为影响经济外交的器物性因子。^⑦

“运行成本论”的分析类型认为经济外交类型的选择受这一类型带来的成本与成效的影响,其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于对经济外交中经济制裁类型的探究。杨祥银从成效的角度探究了经济外交类型的影响因素,指出目标国家对贸易的依赖程度、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替代品寻找的难易度塑造了其应对经济制裁型外交

① 邱丹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学思考》,《当代亚太》2005年第1期,第8~13页。

②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外交评论》2003年第4期,第58~64页。

③ Mario Biggeri and Marco Sanfilippo, “Understanding China’s Move into Africa: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7, No. 1, pp. 31~54.

④ 江瑞平:《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40~55页。

⑤ 周永生、刘锦明:《经济外交与“经济全球化”——机遇与挑战、竞争与合作》,《外交评论》2003年第4期,第58~64页。

⑥ 俞正樸、阙天舒:《体系转型和中国的战略空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29~35页。

⑦ 王逸舟:《中国外交影响因子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第6~17页。

的应变和转嫁能力,这一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度共同影响了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动机;^①石斌把采取经济制裁的动机概括为惩戒、威慑、强制或胁迫、显示决心四大类,这些动机让目标国家承担一定的经济代价,从而改变其立场或政策;^②相较之下,Thea Lee 更关注国际社会的反应带来的经济外交类型成本的变化,他认为多边制裁比单边制裁更可行。^③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四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一方面,“经济建设论”和“战略导向论”从国内经济利益、政策导向出发关注了中国在经济外交中不同类型选择的国内考量,揭示了中国经济外交的诱发性因素。但这一诱因分析存在着变量过多的缺陷,缺乏一定的理论简约性。更重要的是,这一解释模型忽视了中国在同一时期采取不同经济外交类型的状况。例如,在中国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并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针对 1992 年法国对台军售的事件,中国对其采取了警示性较为明显的经济施压行为,并一直持续到 1994 年。另一方面,“体系推动论”和“运行成本论”着眼于整体的国际环境和目标国家,有助于解释国际环境以及目标国家对中国经济外交类型选择的推动作用,但这样的分析模式往往将中国的经济外交行为置于被动状态,从而忽视了这个过程中中国行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总之,现有的研究文献从多个角度,采用不同的变量来解释中国经济外交的不同类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为本文的研究框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现有的影响因素分析缺乏一定的简约性,从而难以把握发挥关键作用的因子;另一方面,当前的主要研究对于中国与目标国家的实力对比多集中于经济制裁的类型中,在其他经济外交类型的研究中忽视了双方互动过程产生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补充。

① 杨祥银:《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政策还能走多远——从冷战后的经济制裁走向谈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5 期,第 56~60 页。

②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8 期,第 24~48 页。

③ Thea Lee, “Assistant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ublic Policy Department, AFL-CIO, A Speech before the Senate Task For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September 8, 1998.

二、利益、相对实力与中国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在本质上与其他外交方式并无二致,其外交类型的选择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以实力为基石,以利益为导向。^① 因而,本文将根据利益与相对实力来划分中国经济外交类型。

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实现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依归。^② 与此类似,汉斯·摩根索认为,外交政策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③ 因而,外交政策可以被看作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其政策方向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基于利益考量的国家行为。在界定外交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对国家利益的评判和认知,传导到经济外交领域,就转化为不同类型的经济外交手段。而对于国家利益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利益的属性判断和主体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般而言,根据资源的类型,国家利益可以划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以及安全利益等。对于国家利益的判断则主要是基于利益的属性和互动产生的。在国家利益的属性上,张旗根据利益的重要程度,将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非重大利益3类,其中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政策,相较之下,非重大利益的影响力较小。^④ 为简化影响因素,本文主要探究在同种属性的利益影响下中国经济外交的类型选择。王日华以先秦国家利益观为基础提出了利益互动的4种逻辑:共利共损、相互损益、相互依存和互为零和。^⑤ 共利共损下的利益互动体现了两种利益间的正相关性,在这种情形下的利益主体往往采取合作的方式维护

① 周鑫宇认为公共外交与其他外交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是运用一定的权力手段保障国家安全、追求国家利益”。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96~110页。

② 王公龙:《国家利益、共有利益与国际责任观——兼论中国国际责任观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1~28页。

③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590页。

④ 张旗:《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第103~121页。

⑤ 王日华:《先秦国家利益论及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136~154页。

共同的利益；相互损益则强调了利益的负相关性，与之相关的利益主体往往更倾向于采取对抗性的政策和行为；相互依存和互为零和则显示了利益间的因果关系。而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国家往往更加关注自身，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来分析这4种互动的逻辑，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国家利益增益和国家利益受损。增益型的国家利益往往推动国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经济外交手段；与之相反，损益型的国家利益会促使国家倾向于使用消极、强制的经济外交措施。例如，1978年越南在中越边境挑起争端，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此之后中国停止对越军事援助，并在经济外交中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

实力是行为体的属性，^①在国际社会中实力的升降影响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和行为选择，而实力基础上形成的力量结构是选择和运筹经济外交类型时需要考虑的客观环境因素。力量结构由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构成。绝对实力来源于国家内部经济、军事以及科技等因素的增长与消减，是经济外交运行的基础；相对实力来源于国家间力量的比较，针对不同的互动对象，形成不同的国家相对实力，它影响着经济外交运用的成效。当一个国家在同一时期绝对实力不变的情况下，在经济外交类型的选择上，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就成为主要的衡量指标。从实力运行的功能来看，相对实力能够发挥自助和它助两种效用，^②对应到国家行为层面就体现为国家的惩罚和互惠机制的运行。正如达契尔·克特纳等提出的相对实力通过提供或撤回资源的方式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③在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升的国际环境下，经济运行中资源的流通与扩散在深化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外交选择的重要砝码。一般而言，当两国对比实力相对均衡时，其对于资源的获取路径和方式大体相同，惩罚性的经济外交类型往往成效甚微，使用不当甚至会适得其反，因而双方更倾向于采取竞争型或者合作型的方式实现双方的利益互惠目的。史蒂芬·奎昆布什

① 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49~79页。

②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③ Dacher Keltner, Deborah H. Gruenfeld and Cameron Anderson,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10, No. 2, 2003, p. 265.

和朱里曼·芬戴琦在研究国家争端的过程中提出力量对比与争端的协调方式存在联系。他们认为,当争端双方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的状况下会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而在力量失衡的情况下施压型协调成为主要解决手段。^①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外交的类型选择上,当双方相对实力趋于平衡时,国家在选择经济外交类型时会更加缓和与慎重;而在相对实力相差较大时,实力较强的一方,会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经济外交类型的选择会更具张力和更为多样。

经济外交作为国家外交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同类型手段的运用影响着外交目标的功效。当前学界对经济外交类型的划分各有标准,尚未形成统一。约瑟夫·格里科和约翰·伊肯伯里将经济外交的类型划分为经济激励和经济制裁两大类。^②经济激励强调了基于实现政治目的或引导目标国家改变其行为的动机而提供经济利益的经济外交行为;经济制裁倾向于从本国利益维护的目的出发,对于与其有经济往来行为的国家采取惩戒式的经济优惠取消、中断或制裁等行为。在经济制裁的划分上,石斌以手段的强制性为标准将其进一步细分为说服性积极制裁和强制性消极制裁两种手段。^③本文在对以往学界划分的借鉴基础之上,将经济外交的类型划分为合作型经济外交、援助型经济外交、施压型经济外交和制裁性经济外交。合作型经济外交强调互动双方在经济领域资本、技术以及人才的合作与流动,以此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提升国家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援助型经济外交往往由相对实力较强的一方发起,对相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声誉或地位等政治利益。施压型经济外交相较于制裁型经济外交在经济层面的惩罚力度较小,在行为的实施上通常会较为谨慎地采取推迟或撤销“胡萝卜”式的现有经济政策,而非“大棒式”的惩罚机制。结合利益和相对实力这两个分析变量,中国的经济外交形成了以下类型组合(见表1)。

① Stephen L. Quackenbush and Jerome F. Venteicher, “Settlements, Outcomes and the Recurrence of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6, 2008, pp. 723~742.

② [美]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著,王展鹏译:《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③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24~47页。

表 1

经济外交的类型

相 对 实 力 利 益	相差较小	相差较大
利益增益	合作型	援助型
利益受损	施压型	施压型 & 制裁型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而言，当国家间相对实力相差较小且通过经济外交能带来一定收益时，国家更倾向于使用合作型的经济外交；当国家间相对实力相差较小但存在利益受损的情况时，强制性的外交手段往往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升级，从而使经济外交运用的目的和效果呈现南辕北辙的状态，因而为改变目标国家的政策或立场，国家往往采取施压型的经济外交。当国家相对实力相差较大且具有利益增益时，实力较强的国家会采取援助型经济外交，以达到塑造和维护国家形象的目的；当国家相对实力相差较大且会带来利益损害时，除了施压型的经济外交类型，制裁型的经济外交手段也会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从而发挥其惩罚和威慑作用。

三、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证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外交日渐成熟，成为外交体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为检验第二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本文依据相对实力的两种情形选取了法国和蒙古两个国家，在利益受损的维度上以两国会见达赖喇嘛事件为案例，由此详细分析与探讨两个与中国相对实力各异的国家在利益增益和受损两种情况下，中国采取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外交手段。

(一) 法国：“合作大单”与经济施压

2007 年 11 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率领包括 40 名商界领袖在内的 200 多人组成的庞大团队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达成共识，推动双方在核电、航空以及通讯等多个领域展开经济合作。11 月 26 日，温家宝在与萨科齐

的会面中表示,中法之间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双方关系具有战略性、全面性、稳定性。^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邢骅将萨科齐的访华评价为维护法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需要。^② 中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表示,此次访问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翻开新的一页。^③ 萨科齐的本次访问推动中法两国签署了总值 200 亿欧元的经贸合作协议,包括全球核电历史上最高金额的民用合同——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与广东核电集团价值 80 亿欧元的核能领域一揽子合作协议、价值约 100 亿欧元的 160 架商用客机的销售合同以及通讯领域总额为 7.5 亿欧元的移动通信解决方案及服务框架协议。

从利益角度而言,中国与法国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利益增益。萨科齐的本次国事访问将中国作为亚洲首个访问国家,同时在双方的会谈中明确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和“入联公投”,这一态度和声明在承认中国的国家地位的同时也维护了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时,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成员国之一,在当时法国是欧盟成员中与中国进行合作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因而从经济的依赖性上看中国与法国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需求和广阔的经济市场,双方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从相对实力上来说,法国为发达国家,中国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相对实力呈现均衡态势。同时,中国在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的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出现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的现象,面临着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法国在这一方面拥有更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因而环保项目的合作中,法国在从中国方面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在技术和产品环保性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除此之外,萨科齐还提出将互惠与合作作为两国行动的核心,^④ 因而中国与法国在经济领域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合作,萨科齐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08 年中法双边贸易额为 584.8 亿美元,增长

① 《温家宝称中法战略趋向使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https://news.qq.com/a/20071126/001838.htm>。

② 《中国将从法国购买 160 架空客飞机》, <https://news.qq.com/a/20071126/001832.htm>。

③ 《中国驻法大使:萨科齐访华将增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6562836.html>。

④ 《萨科齐明日访华称法国忠实于对中国的承诺》, <https://news.qq.com/a/20071124/000461.htm>。

12.9%，其中，法国对中国出口132.7亿美元，增长6.2%；自中国进口452.1亿美元，增长15.1%；法方逆差319.4亿美元，增长19.3%，中国在法国主要出口伙伴中的排名上升到第9位，在法国主要进口来源地的排名更升至第5位。

在完成访华后的第二年，萨科齐对中国的态度呈现大反转，在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2008年6月，具有法国总统和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双重身份的萨科齐在接受采访中将中国政府与达赖的关系作为法国参与北京奥运会的条件。这一言论引起中方严重不满，并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慨，在国内掀起了抵制法货的呼吁。2008年7月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记者会上对这一奥运政治化的行径提出明确反对。^①此后，萨科齐在11月高调宣布将于12月会见达赖，并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于12月在波兰华沙同达拉喇嘛会面。此次事件发生后，中国推迟了原定12月在法国举行的中欧峰会，并取消了温家宝总理对法国的访问，在2009年举办的G20金融峰会上将法国总统萨科齐列于会客名单之外。

西藏问题关乎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强烈抗议和反对，坚持与流窜国外的达赖喇嘛会面，并将西藏问题与奥运会挂钩，这样的行为侵犯了中国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严重危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因而除了在国际领域对法国的这一行为进行强烈谴责之外，在经济外交的选择上中国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方式。同时，由于中国与法国相对实力相差较小，且在此之前中法双方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相较于强烈的经济制裁措施，带有威慑信号的行为更能够引起法国资本市场的恐慌，推动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行为进行施压，同时在国际层面还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面临着其所在区域组织——欧盟中其他成员国的指责和压力。因而，中国采取了施压型的经济外交手段来处理这次事件。据法国海关统计，2009年1~6月中法双边贸易额为234.7亿美元，减少15.8%。其中，法国对中国出口49.1亿美元，减少27.1%；自中国进口185.6亿美元，减少12.2%。

^① 《外交部就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触等答问》，http://www.gov.cn/xwfb/2008-07/01/content_1032862.htm。

施压型的经济外交策略的实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对法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并最终通过这一外交策略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2009年4月1日中法两国外交部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在这一公报中法方明确表示,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①

(二)蒙古国:经济援助与制裁

蒙古作为中国的邻国,自两国建交以来多层次的经济外交成为双方重要的外交模式。进入21世纪,随着中蒙关系的深化,经贸往来不断加强,蒙古国经济迅速发展,而中国也成为蒙古最重要的出口国以及进口商品来源国,连续15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8月,应蒙古国总统邀约,习近平对蒙古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署多项重要合作经济项目,同时同意蒙方在出海口、过境运输等方面向蒙方提供支持和便利。除此之外,习近平主席提出在民生领域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无偿援助规模。在人才培养方面,中方承诺增加1000个中国政府全额奖学金名额,就使用中方援助建设乌兰巴托残疾儿童发展中心项目立项换文;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国政府向蒙古国提供多笔优惠出口买方信贷额度。2016年在中方优买贷款的支持下,多个项目启动实施。

在周边外交中,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外交政策。外交部长王毅指出,发展好中蒙关系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中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有利于中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对中国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因而,从利益增益的角度来看,对蒙古积极的经济外交政策在提升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化两国关系的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负责任区域大国的形象,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从相对实力上来看,蒙古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与旅游资源,但因其深处内陆,经济发展水平较

^① 《中法两国外交部4月1日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http://www.gov.cn/jrzq/2009-04/01/content_1274928.htm。

^② 《走亲访友话合作 携手发展创未来——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6289.htm。

低,金融业欠发达,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两国的相对实力相差较大。在外交理念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独行快,众行远”的观点,提倡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因而中国对蒙古国的经济外交中,援助型经济外交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提供的一批惠及蒙古国的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陆续开展,“南南合作”项目、电子医疗项目、粮库项目以及新世纪教育项目等涉及社会民生多个领域,中蒙进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期。2015年上半年,蒙古国对华贸易总额为27.13亿美元,占其外贸总额的64.5%。其中,对华出口20.46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86.3%;自华进口6.67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36.27%。^①

中蒙两国在战略上为全面伙伴关系,但同时在西藏问题上蒙古国也发生过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201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应蒙古国甘登寺邀请对蒙古国进行访问,这一行为引起了中国的关注。在11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强烈要求蒙方从维护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大局出发,不允许达赖窜访。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蒙方在达赖窜访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损害了中蒙关系政治基础,对双边关系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但蒙古国不顾中方多次劝阻,仍允许其进入蒙古国境内。作为回应,中国无限期推迟了中蒙政府间会议和中蒙矿能合作会议。此外,中国除对蒙古国的铜矿等出口产品征收额外费用外,还对这些产品出口的口岸进行限制。^②同时,中国方面从12月1日起对过往车辆征收通行费。

中国通过在经济外交中运用施压型与制裁型经济手段并行的方式推动了事件的解决。2017年1月24日中蒙两国外长进行了通话,确认蒙古国不再允许达赖访蒙。此次事件中,蒙古不顾中方多次劝阻依旧采取了危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在此情况下,中国实施了消极和抵制的态度;在中蒙两国相对实力的

^① 《蒙古国2015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数据》, <http://mn.mofcom.gov.cn/article/zxhz/tjsj/201507/20150701064372.shtml>。

^② 《外媒:达赖窜访后中国对蒙出口产品开始加征费用》, http://news.ifeng.com/a/20161206/50369008_0.shtml。

对比中,双方实力相差较大,相较于蒙古国中国获取资源的途径和类型更为多样,因而消极的经济行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影响较小,而中国作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投资国,其制裁型的经济外交类型选择对蒙古国国内经济发展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不仅取消了相关会谈,而且还采取了相关的经济手段,这样惩罚性的行为选择最终影响了蒙古国的立场和政策,从而实现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目的。

四、结 论

中国在经济外交中的类型选择交错着利益评判和实力对比的复杂考虑。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认为经济外交行为中利益损益比较以及相对实力考量这两个因素影响了不同类型的选择。这一影响因素的结合与把握,丰富了现有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解。通过以法国和蒙古两个国家的4个事件为例,详细论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影响着中国采取不同力度的经济外交类型。以往对经济外交中行为体双方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经济制裁领域或关注经济的依赖性。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国家在选择经济外交类型时,对于相对实力较为平衡的国家多从经济利益层面出发,追寻的往往是物质性的利益;当双方实力相对悬殊时,中国在经济外交的选择上则倾向于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影响力等非物质性利益出发。另一方面,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外交的类型,但当外交事件涉及国家核心或重大利益时,这种经济依赖性的影响力则会大大降低。此时,国家会根据两个国家之间相对实力的比较,在分析克制性或直接性的措施对目标国家产生损害程度的基础上选取不同类型的经济外交手段。

第二,事件本身对国家利益的损益推动中国选取性质各异的外交类型。当前学术界对利益的影响分析大多从利益的重要性出发,将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边缘利益,并根据这些利益来划分经济外交类型。而在国家交

往中,当一个国家利益受损时,排除国家对于相对实力的比较,消极的经济外交往往是主要的外交类型;而当利益增益时,国家往往会运用积极的经济外交手段。这三种层面的利益划分使影响因素变得复杂,头绪过多,往往抓不住影响国家经济外交类型的关键因素。

总之,随着各国经济外交的发展和国际社会中力量结构的转型,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类型的因素会不断增加和转变。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最终都离不开对利益增损和国家间相对实力的衡量。